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1年3月19日)

1、《国家利益》：拜登的对华政策过软

3月18日,《国家利益》杂志发表了特朗普和乔治·布什政府的国务院高级顾问惠顿(Christian Whiton)的文章《拜登对华战略——一言以蔽之:“软”》。文章指出,尽管大西洋两岸都预测拜登会继续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但这种预测或将是错误的。文章称,拜登就任总统的两个月以来,日韩与美国高级官员进行了会晤;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关税和美国海军在台海的行动也并未停止;布林肯亦批评了中国的对港政策。但作者认为,这只是美国政府对传统盟友关系的维护,以便随后与中国缓和关系。拜登似乎在重拾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等。拜登本人对中国的批评很有限。而他除了中国之外,也难以找到新政府所希望的外交突破。拜登政府或将从减少对华关税或出口管制、举行首脑峰会以及解决孟晚舟问题入手,扭转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美中之间的重大改变即将到来。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joe-bidens-strategy-china-boils-down-one-word-soft-180510>

撰稿人:张昭璞

2、《外交事务》：如何制定持久的中国战略

3月17日，《外交事务》杂志刊登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项目主席麦艾文(Even S. Medeiros)撰写的《如何制定持久的中国战略》一文。文章称，特朗普政府使美中关系由高转低，新的对华政策框架要为以“风险管理”为基调，不再追求为了合作而弱化竞争。作者认为，美中双边关系发展的历史表明，美国成功的对华政策取决于清晰的优先次序、完善的决策程序以及持续的沟通。而特朗普在这三个环节都是失败的。作者指出，重建对华政策框架，前提是要接受美国对华战略存在结构性制约因素，包括：首先，美国对华的一些政策主张不可避免地有助于中国建立起挑战美国利益的能力；其次，美中两国都不是现状强权，都是选择性修正主义者，都想要按照自身目标改革而非推翻现行体制；最后，美国能否停止通过制造与华对抗的政策来吸引和维持美国国内的投资。在此基础上制定对华政策持久框架需把握三个方向：第一，明确对华关系中哪些属于/不属于竞争范畴；第二，美国要重新调整对美中关系所能取得成果的预期，并尝试重设中国对美预期；第三，美国政府也需重建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作者向拜登政府提出的具体实施步骤包括，进行国内讨论；确定明确的美国优先事项；与中国同行建立沟通桥梁，确保清晰、一致和可信的交流，但应放慢沟通进程。作者还指出，授权一个与总统关系密切的权势人物与北京谈判所有事情的“中国沙皇模式”存在风险。美国的对华政策需反映两国、双边关系和

世界的重大变化，双方需以一种接受和限制竞争、容忍分歧的态度重建两国关系。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3-17/how-craft-durable-china-strategy>

撰稿人：王欣然

3、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印太军力平衡评估国会证词

3月17日，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发布防务项目高级兼职研究员托马斯·舒贾特（Thomas Shugart III）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的证词《趋势、时间线和不确定性：对印太军力平衡的评估》。舒贾特称，由于中国整体军力不断提升，2020年代中后期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威慑失败的高风险期。中国解放军远程导弹部队快速扩张、远程轰炸机部队现代化发展加速、致力于建设世界级的海军力量，使中国遏制或拒止美军介入印太地区的能力大大提升。尽管如此，入侵或胁迫美国的地区盟友对中国而言仍是高风险的举措：美军在战斗经验、作战平台灵活性和关键领域作战能力方面仍有优势；而中国缺乏运送和维持大规模作战部队的海空能力，航母和大型两栖舰艇、核潜艇和轰炸机群在远离本土海岸的区域十分脆弱。尽管如此，中国商船队的参与和强大的造舰能力有助于其弥补这一弱势，增强力量对比不确定性；解放军有意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降低美军反击能力，且正为此开展演练；电子干扰技术的应用也将使战争结果出乎意料。作者建议，美军应强化同盟友的合作，提高威慑的可信度；具体而

言，需粉碎中国先发摧毁美国及其盟友指挥控制系统和火力的计划，做出准备持久战的清晰态势，同时应使盟友和伙伴充分意识到中国能力不断增长导致的威胁和美国及盟友方面军力威慑失败的严重后果。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congressional-testimony/trends-timelines-and-uncertainty-an-assessment-of-the-military-balance-in-the-indo-pacific>

撰稿人：崔元睿

4、《国家利益》：中国“两会”对首届美中峰会的影响

3月17日，《国家利益》杂志刊登前美国劳工部负责国际事务副部长的政策顾问奎因·马斯基克（Quinn Marschik）撰写的《中国“两会”对首届美中峰会的影响》一文。作者指出，2021年，两会通过《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2021-2025年）》和《2035年远期目标》表明了中国2021年及今后的外交政策重点，其中两个方面的事务应当尤为引起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进行美中安克雷西会晤前的注意。一方面，国家主权问题。中国在“两会”期间继续强调对香港、台湾和边界地区的主权及“一个中国”原则，基于此，作者建议拜登政府应仔细分析中国全国人大颁布的各项相关法律，制定不损害美国利益的政策。同时，“两会”表明今后五年中国财政部将支持包括新疆、西藏在内的西部新形式发展，因此，拜登政府应监控中国边境地区的行为并制定具备可实现目标的政策，而不应为宣扬价值观和道德而

不必要地危及美国安全与繁荣。另一方面，军事现代化问题。“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建设一支训练有素、技术精良的现代化军队的重要性，虽中国军费开支不及美国，但中国具有更大的购买力并更关注地区问题。因此，拜登政府在制定和实施中国战略时，应慎重考虑北京的决心和能力。若不照此进行，必将损害美国利益。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keptics/how-china's-two-sessions-will-influence-first-us-china-summit-180489>

撰稿人：王欣然

5、《外交事务》：美中之间的竞争是价值观之争

3月16日，《外交事务》网站刊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亨利·基辛格杰出全球事务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与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确保民主安全联盟”联合主任扎克·库珀（Zack Cooper）共同发表的文章《美中竞争是一场关于价值观的竞赛：大国竞争不能只关注利益》。文章对一些现实主义者“在美中竞争中该将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竞争分离”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和反驳。作者回顾了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历史，认为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促进美国赢得冷战的重要因素。面对与中国的竞争，剥离意识形态不符合历史和战略，也不现实。作者强调自由国际秩序下，制度间存在的道德地位不对称使民主价值成为美国最大的竞争优势之一，其可被用于动员美国社会、巩固国际联盟。面对

中国对内专制、对外支持威权的行为，美国应当利用之激发各界对民主的热情。同时，引入意识形态不代表冷战中清教徒式的排斥、不明智的干预及外交的僵化。美国仍应做必要的妥协，通过谈判管理竞争，并将气候变化等可合作领域剥离出意识形态竞争。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3-16/us-china-rivalry-battle-over-values>

撰稿人：任怡静

6、《报业辛迪加》：全球经济或将复苏

3月17日，《报业辛迪加》刊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的文章《全球复苏的走势》。文章指出，目前，疫苗在北美和欧洲等较为发达经济体有着较高接种率；在亚洲，尽管缺乏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计划，由于病毒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控制，所以其经济也开始了快速的增长；与此同时，部分低收入国家则需要国际社会的疫苗支持。在目前疫苗接种情况下，全球经济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和2022年迎来迅速的复苏。一方面，数字化部门的增长或将放缓，但不会下降，因为线下活动也需要其服务的支持；另一方面，被部分关停的服务行业的重新开放，以及压抑已久的民众需求，会改善世界整体经济表现，并降低失业率。供给的暂时性减少和需求的激增或许会带来短暂的通胀，但这不足为虑。同时，金融市场上的变化，也都显示了对于上述趋势的预测。不过，即使病毒得

到了初步控制，国际旅游业并不能像其他当地服务业一样快速恢复。另外，由于疫苗的全球推广速度远慢于发达经济体，应给予新兴经济体的疫苗生产与部署以更多的关注。文章认为，2021 下半年和 2022 年，全球经济将会迎来高速复苏，而传统的接触性服务业则会处于领先地位。尽管在发展中国家的疫苗推广和跨境旅行方面仍存不确定性，但这两个问题是完全可控的。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vaccinations-restore-overall-economic-growth-advanced-economies-by-michael-spence-2021-03>

撰稿人：张昭璞

7、IISS 分析新冠疫情对欧洲安全的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

3 月 16 日，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发布报告《新冠疫情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对欧洲安全的影响》。该报告是 2020 年 9 至 12 月 IISS 与 Hanns Seidel Foundation 共同举办的六次线上研讨会的观点汇总。报告认为，尽管疫情对世界的影响仍具较大不确定性，但有必要对其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做初步评估。在经济方面，全球范围内经济明显衰退，促进平等和减贫事业受到重大打击，供应链不安全性充分暴露，民族主义情绪影响，贸易战、科技战、关税战及人才竞争频发。但疫情也促进了医疗服务、线上经济等方面的技术创新，在推动绿色转型方面带来一些机遇；金融市场吸取金融危机教

训更为有效。同时，疫情促使各国反思公共债务水平等经济稳定的指标，也提醒欧洲需保持其生产力与竞争力。在政治方面，疫情放大了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民主与专制制度竞争愈加激烈；民粹主义可能回归；影响国防采购和工业生产能力，转变防务合作、军事训练方式。面对美国对欧洲的疏远，欧洲各国普遍增加军费。报告强调北约应针对疫后新形势积极调整，认清并应对包括美中在内的大国力量再平衡对欧洲防务的影响。报告总结称，疫情为世界带来新风险的同时，传统战争冲突并未消失，面对新老风险的叠加，各国需认识到自身应对风险可调动资源的变化，广泛评估风险，抓住相关机遇，改革传统能力建设体系，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类危机保持警惕。

<https://www.iiss.org/blogs/research-paper/2021/03/covid-19-european-security>

撰稿人：崔元睿

8、卡托研究所发文分析拜登政府的对朝政策困境

3月15日，卡托研究所发布国防政策研究主任埃里克·戈麦斯（Eric Gomez）的文章《拜登的亚洲困境：盟国和对朝外交》。文章指出，虽然拜登政府一直强调团结盟友，但在东亚地区，与盟友达成安全一致颇有难度。日韩对朝鲜核问题期望和优先事项的差异使拜登政府的对朝政策很难使两国都感到满意。韩国希望通过减少非军事区军事行动风险、加强半岛经济联系、改善基础设施和呼吁发表朝鲜半岛和平宣

言等方式推动朝韩接触，最终实现无核化。日本则倾向于施压而非接触，拒绝在朝鲜无核化取得重大进展前与之接触，也反对在朝鲜放弃核武器前取消制裁。文章分析了“四边机制”联合声明中美国表述从“朝鲜半岛无核化”到“朝鲜无核化”的变化，认为美国或将采取更符合日本偏好的对朝强硬政策，使美日盟友关系更加紧密。作者提醒：对朝强硬政策不太可能推动朝鲜无核化和军控进程。拜登政府应更多地着眼于美国利益。

<https://www.cato.org/blog/bidens-asia-dilemma-allies-north-korea-diplomacy>

撰稿人：许卓凡

9、美专家反思并展望本国反恐政策

3月15日，在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举办的一场政策论坛中，该研究所反恐和情报项目主任马修·莱维特（Matthew Levitt）、美国进步中心代理副总裁卡特里娜·穆里根（Katrina Mulligan）和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恐高级主任克里斯托弗·科斯塔（Christopher Costa）就拜登执政时期的反恐事务发表观点。与会者均看到美国优先事项从反恐向大国竞争的转向，但强调二者并不互斥，美国反恐架构有必要针对新形势加以调整，三人就此提出了建议。马修·莱维特指出，美国应转变过去那种以军事力量为中心的、美国领导的、合作伙伴提供支持的反恐机制，使合作伙伴成为领导者，并加强本国民间反恐能力建设。卡特里娜·穆里根指出，美国应通过加

强反恐情报能力建设、利用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State Department's Global Engagement Center）等未充分发挥效能的机构来更新其反恐政策架构，同时继续观察外交手段推动反恐进程的效果。克里斯托弗·科斯塔认为，国内恐怖主义如今也成为一个优先事项，伊斯兰极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发展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对前届政府相关政策行动效果的评估及与相关国家（如沙特）的合作是必要的。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rethinking-us-counterterrorism-two-decades-after-911>

撰稿人：许卓凡

10、《外交事务》：伊朗经济抵抗政策面临两难处境

3月17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刊登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德贾瓦德·沙雷西·伊斯法哈里（Djavad Salehi-Isfahani）的文章《伊朗抵抗型经济政策的困境》。文章就伊朗“抵抗型经济”政策的内容、伊朗国内经济状况、外界对伊经济制裁所带来的影响及美伊两国国内对经济制裁手段效用的不同看法进行分析。文章指出，当前美伊两国均不急于重返谈判桌，原因在于双方都在耐心观察伊朗经济发展走向。双方对伊朗经济发展迹象的解读角度不同，部分美国人认为伊朗普通民众遭受的苦难最终将导致大多数民众反对其政府。伊朗最高领导人则认为短期伊朗经济遭受的损失将促进实现长期经济自给自足。

作者认为，近年来，美国对伊经济制裁使伊朗经济发展遭遇严重挫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但这一制裁手段并未达到美国的目的。伊朗领导人并未忽视美国经济制裁所带来的后果，他们的分歧在于结束经济制裁的时间。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急于与拜登政府在今年 6 月选举前达成新协议，而伊朗国内各保守派势力包括最高领袖，则力图向西方国家与国内对手证明伊朗强劲的抵御能力。文章指出，伊朗国内保守派更关注经济总体的运行情况，而不是民众的生活水平在伊朗，除石油行业出口遭到严重打击意外，其它行业运行情况在经济制裁背景下依然保持稳定，在制造业领域的生产力甚至有所提升。最后作者指出，若想实现长期经济自力更生，未来伊朗仍需与美国达成新的协议。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middle-east/2021-03-17/dilemma-irans-resistance-economy>

撰稿人：任怡静

撰稿人：张昭璞、王欣然、崔元睿、许卓凡、任怡静

审稿人：周武华、王静姝